

国民經济計划中的 比例关系問題

楊英杰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国民經济計划中的 比例关系問題

楊英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 年 · 北京

国民經济計划中的比例关系問題

楊英杰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外交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 字數 44,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7,500 定价 (7) 0.19 元

統一書号 4001·223

封面設計者：李紫东 校對者：王邵文

目 录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基本条件和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	1
一	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规律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关系	1
二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条件	11
三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平衡法	14
第二章	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几个重要的比例关系	19
一	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例关系	21
二	大力发展农业,农业同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39
三	相应地发展运输业,运输业同工业、农业生产的比例关系	47
四	商品供应同人民购买力的比例关系	49
五	文化建设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	51
六	经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54
七	其他比例关系	60

第一章 計劃經濟的基本條件和 計劃工作的基本方法

一 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同 國民經濟計劃化的關係

在社會主義經濟占居領導地位的社会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起着主導作用，其經濟是以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為特點的，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在起生產調節者的重要作用，國民經濟必須計劃化，實行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是一種客觀的經濟規律，它在社會主義經濟占居優勢的社会中存在着和發展着。“這個規律要求：有計劃地領導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切部門，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國家的物力、人力和財力。”^① 國民經濟的計劃化、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是我們社會的主觀方面。我們黨和國家機關根據客觀存在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以及其他經濟規律制定國家的經濟計劃，用這種有科學根據的預見性的計劃來指導國民經濟的活動。因此國民經濟的計劃化——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應當尽可能地符合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的要求。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要“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整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

①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六二頁。

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① 這是由於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這一個部門，必須緊密地依靠着另一個部門，比如工業的發展，必須同資源情況、原料供應、運輸設備以及消耗工業產品的農業有計劃的結合起來；比如農業的發展，必須同供應農業機器、化學肥料、使用農產品為原料進行生產的工業部門，同運輸部門以及國內外商業部門，同人民的消費有計劃的結合起來。只有按照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要求的恰當的比例關係，制訂出使全社會目的統一行動統一的總計劃，方能引導整個國民經濟有機地配合起來，順暢地發展前進；方能最合理地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財力，在不斷改進技術和不斷擴大生產的前提下，滿足日益增長着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否則，就不可能很好地組織生產，就可能為國民經濟帶來紊亂，使得國民經濟這一部門或者那一部門發生故障，因而阻礙整個國民經濟的順暢發展，結果將是阻礙生產力的提高，妨礙人民生活的改善。

這樣看來，道理就很清楚了。由於我們的社會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占居領導地位的社會，它就決定了全部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我們必須用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來規劃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這種情況也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經濟占居領導地位的社會才有可能，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不可能的。在封建社會中，地主的莊園或農民家庭的生產也曾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如“一年之計在於春”這類話就是一個例子；但是計劃僅僅限於一個莊園或一個家庭，它的範圍既小，而且又是不穩定的，它還遠不能使得整個社會都按照計劃進行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工廠以至一個托拉斯的生產是有計劃的，甚至是有嚴密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二卷第三六八頁。

的計劃的；但是由於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他們生產的目的是資本家取得平均利潤或最大利潤，所以就同社會化的生產相矛盾，就使得全社會的生產成為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着經常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它是不能使得全部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的。只是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由於社會化的生產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結合，由於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着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才有可能而且必須使全部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是這種社會特有的標志。

我國目前正在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我們所實行的這些計劃，就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機關認識了我國社會的客觀經濟規律，認識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而制定出來的行動綱領。我們有了長期的和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就可以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建築業等等）和各方面（如生產、基本建設、勞動工資、成本財務等等）在統一的整體的國民經濟計劃之下組織起來，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前發展。我們在季度計劃和年度計劃之外，所以還需要有五年計劃，乃是由於僅僅只有年度計劃而無五年計劃，就會使得國民經濟的發展缺少明確的方向，缺少奮鬥的遠景，而且國民經濟之中有些部分（如基本建設等）不是年度計劃所能規劃的，它的本身就要求作出五年的以至更長時期的規劃，從而也要求其他部門作出相應的規劃，因而必須要有五年計劃。但是僅僅只有五年計劃還不可能將方向性的要求圓滿解決，比如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除了恢復時期三年以外，大約還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因此就要求制定將過渡時期總任務具體化的十五年遠景計劃；比如我

們要在經濟方面(即全國每人平均生產量)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國家，這就要求制定更加長期的遠景計劃。由此可見國民經濟的長期的和年度的計劃對於我們的重要性了。

這裡我們要回答有些人認為：“過去我們沒有國民經濟計劃也過了日子，為什麼現在一定要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呢”的問題。是的，在過去我國沒有國民經濟計劃也過了日子，但是那時我國是被舊社會制度限制着不可能實行國民經濟計劃。遠的不說，即從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來說吧，那時由於我國經濟落后，工業落后，由於落后，不僅僅不能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而且受了許多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美、英、德、法、日本以至葡萄牙這些帝國主義都侵略和壓迫過我們，那種日子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血腥統治和殘酷剝削下的日子，那種日子對於我國廣大的勞動人民是痛苦悲慘和暗無天日的日子，是忍飢受凍和家破人亡的日子，是受屈辱和被奴役的日子，難道這還需要列舉許許多多的歷史事實嗎？那個時候我國還根本沒有具備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基本條件（人民民主專政，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占居優勢，將各種經濟成份改造為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等）。現在我國已經具備着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條件，已經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來消滅階級和剝削，消滅失業和貧困，基本上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國家繁榮富強、人民生活幸福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國。這種計劃經濟不正是合乎全體勞動人民的切身需要的嗎？

這裡我們還要說明另外有些人怕受時間和數字的束縛的問題。有些人過去沒有嚴格遵守時間和精確數字的觀念和習慣，于是在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生活中，在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化之

后，到处碰到時間和数字的問題，感到很受束縛。其实这是一个認識和習慣問題。我国实行計劃經濟，特別要求宝貴時間和要求有准确的数字。在旧中国，以及在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前，一部分劳动人民和一部分干部，不大注意時間和数字，这乃是受当时經濟生活和工作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对時間往往是以“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計算的，对于数字也往往用“大概多少”“差不多”这些不太确切的东西来表达。現在实行計劃經濟，生活和工作都要求我們改变对于時間和数字的不妥善的观念和習慣。本来每种客觀事物本身就包括時間在內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所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离开時間的存在是和离开空間的存在同样是最大的荒唐”。^① 比如我們說到超音速飞机，那就是意味着这种飞机飞得很快，每小时上千公里；我們說汽車，那就是意味着它每小时可以跑几十公里以至一百公里；我們說牛車，那就是意味着它慢得每小时只能走上三、四公里。国民經济計劃規定的任务，有的須要几年完成，有的須要几个月完成，有的需要几天、几小时、几十分以至几十秒完成，如阜新露天矿大电鏟不到卅秒鐘就是一电鏟煤，約有四、五吨重。有些工厂高度自动化的控制，需要在几秒鐘內解決問題，否則會發生重大事故。这样看来严格遵守時間規定，对于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是个必要的条件。数字是最准确最切实反映客觀事物的一种工具，列宁曾說，有时一个简单的数字比一大篇說明要清楚多了。在国民經济計劃和經濟建設生活中所通常使用的数字，已經不仅仅是个、十、百、千、万，而是往上数到几千亿几万亿，往下数到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了，各种事物本身要求准确数字来表現，我們应当在觀念上和習慣上跟上来。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五二頁。

这里我們还要談談国民經济計划范圍的問題。目前，至少是在我国实行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之內，我們的国民經济計划，是有可能也有必要逐漸扩大其范圍、加强其深度的，是有可能也有必要将国民經济絕大部分納入国家計划的，这样就保證了国民經济納入計划經济的軌道；但是同时对于国民經济中的一小部分，却是很困难而且也不必要勉强地将其直接納入国家計划。我們对于这一小部分經济，是在国家計划允許范圍之內，利用价值規律及其他經济規律，促进它們的發展，作为国家計划的补充。如果不看到前者，不在社会主义改造事業已經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去有步驟地扩展我們国民經济計划的范圍，則我們就会失去本来可以由国家計划直接指导的經济活动的部分，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是不利的；而如果忽視了后者，不顧条件地将一切細小的經济活动都勉强地納入国家計划，那就会形成形式主义，会使經济死滯，也同样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決議”中正确指出：“第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計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計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計划許可的范圍內，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計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場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計划生产的补充。”^① 目前我国列入国家計划的工業产品只有数百种，約占年度計划工業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农业产品也只有粮食、主要技术作物和主要牲畜列入国家計划；列入国家社会商品零售計划的商品只有数十种，約占年度計划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七十，因此，我們应当遵照八大政治报告決議，逐步地扩展計划的范圍。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決議”，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八頁。

从种类上看，有若干万种的工業产品和商品尚未直接列入国家計劃，它們現在占工業产值和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今后将一部分重要产品和商品列入国家計劃，但是还将有若干万种次要的約占工業产值和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产品和商品，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內仍然是不能直接列入国家計劃的。这一部分不能直接列入国家計劃的产品和商品，在我們全国实行計劃經濟的情况下，它們中的絕大部分已經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完全自由生产和完全自由銷售，它們絕大多數將是通过国营商業、合作社商業、国营工業的加工訂貨形式进行生产、銷售而納入計劃軌道的；它們的一小部分，像一些分散而細小的土特产品，一些地方性的手工業产品等等，則在国家計劃允許范围之內依据市場需要而生产而銷售，作为計劃的补充，这是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躍交流，而又滿足日益增长着的人民的需要的。

这里，最后我們还需要談談計劃經濟同价值規律的关系問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国目前已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和国民經济有計劃的發展規律起着統治作用，国家实行国民經济的計劃化，制定和实行国民經济的长期的和年度的計劃来指导全部国民經济的發展和活動。由于社会上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还要通过市場上的交換去实现分配（如輕工業产品，特別是农产品），由于我們工業上生产資料的产品还只是一部分（主要部分）而不是全部經過国家直接調撥，由于我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还必须使用貨幣、信用等等工具，由于各种企業必須进行經濟核算，因此，我們必須在計劃經濟之下，来利用价值規律及与之有关的工具。我們知道：价值規律是商品生产的規律，它随商品的發生而發生，随商品的發展而發展，随商品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它是一个历史范疇。那种主

張在消灭商品生产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价值規律仍起重要作用的論点，正同主張在原始社会中沒有商品生产而价值規律却起重要作用一样的沒有根据。价值規律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些社会都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交换，所以它也發生一定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各种社会中，价值規律主要也是起着从屬的作用，它的作用又是各不相同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虽然商品生产程度大有不同，但是这两个社会占統治地位的还是自然經濟——自給自足的經濟，商品經濟是一种附屬的經濟，因而价值規律不能成为这两个社会的基本經濟規律。在资本主义中，正像馬克思在“資本論”开头第一句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社会的財富，表現为‘一个惊人龐大的商品堆积’，一个一个的商品表現为它的原素形态。”^①而且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已經由小商品生产进入商品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由价值的生产变成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規律成了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爭取最大限度利潤規律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因而在这里价值規律是發展了变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規律或爭取最大限度利潤規律成为基本經濟規律的情况下，价值規律的作用是經過曲折过程表現出来的。以全社会商品生产來說，是經過自由竞争与壟断，盲目的市場供求关系，资本主义的危机——蕭条——复苏——高漲的罪恶循环在調节着全社会無政府的生产。以一个商品來說，它的价格是圍繞价值摆动的，或在价值之上或在价值之下；由于新技术的采用，价值又表現为生产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只是全社会总价格或生产价格才等于总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五頁。

中，是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起統治作用，在这基本經濟規律之下是国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在起全社會生產調節者的作用。由於社會上一部分產品要通過交換而分配，由於各種企業都要進行經濟核算，由於還存在着貨幣信用等等（雖然這些已同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幣、信用不同），因而價值規律就在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和国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規律之下起着一定的作用，國家實行計劃化要主動地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那麼在社会主义中價值規律的作用是什麼呢？我們如何自覺地利用這一規律使其為促進社会主义生產服務呢？這就是當國家計劃工業消費品，特別是農產品的生產時和在市場上進行收購和銷售時，必須注意它們消耗的社会必要勞動量，必須注意他們表現價值的價格，價格合理，才能保證國家經濟的順暢發展，國家計劃的順利完成。在所有國營、合作社營或公私合營的企業中，不論工業、農業、運輸、建築、商業企業，都必須進行經濟核算，計算盈虧，必須計算勞動量的消耗，成本的降低，利潤的獲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應該說這已經不是像資本主義那樣的價值規律了，在這裡我們主要是利用與價值規律有關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會中，全社會的生產已經不像資本主義生產那樣是“一個驚人龐大的商品堆積”，勞動力已經不是商品，而是按照國家計劃生產財富，生產的目的已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為了資本家取得由剩餘價值而來的平均利潤或最大利潤，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經常增長着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在全社會生產上已經不是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無政府的受盲目的供求規律支配的經過周期經濟危機來調節生產，而是按照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和国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的國家計劃來計劃全社會生產，在這裡價值規律是不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的。我們再以受價值規律影響最大的經濟部門——農業生產來看，

我們必須計算各種作物的生產所消耗的必需勞動量，必須規定合理的价格，否則，這種生產就將不能發展，不能完成國家計劃。但是總的講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是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的，雖然有時价格未盡合理，也是大體上按照國家計劃要求進行的。同時，農產品的主要部分——如糧、棉等等是由國家統一收購的，而糧食、棉布是由國家統一銷售的，這樣，在全社會生產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國家計劃而不是價值規律的道理是明顯的。這就是說在計劃農業生產時，一方面我們必須自覺地注意價值規律，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價值規律是從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的規律的。所以那種主張要把我們國家計劃放在價值規律之上，或者主張把全部國民經濟劃分地盤，一個生產領域劃給計劃經濟管，一個生產領域劃歸價值規律管，都是不正確的。我們將全部國民經濟納入計劃，這是說：其中絕大部分直接列入國家計劃，其中一小部分未列入國家計劃，但是列入各部的各地方的計劃，只有很小一部分未列入國家、部、地方計劃而是按市場的需要而生產和銷售，但即使這最後一個很小很小的部分，它們也是在合乎全部國民經濟計劃要求的範圍內進行活動，而且國家是從市場管理來領導這一部分經濟活動。如自由市場，開放以來是起了刺激生產和活躍交流的作用，但是它絕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那種自由市場，不僅經營品種有所限制，而且价格大體上也是遵照國家价格的。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價值規律之上的；在全社會起生產調節者作用的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和國家計劃，而不是價值規律；在國家計劃之下，必須很好地運用價值規律及與之有關的工具（如价格、貨幣、信用等），來為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服務。

二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条件

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就具备了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国就能够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实行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發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三十年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个共和国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而且日益巩固起来，这就是我国能够进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政治条件。因为只有在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重要作用就是领导全体劳动人民按照统一的国家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在“論联合政府”中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①新中国建立之后，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日益坚强，进行了许多社会的政治的改革运动，全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从他们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的正确，他们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斗争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们今天正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下用劳动来从事国家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一〇四页。

設。

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国营經濟在国民經济中占居领导地位。

在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掌握了全国的經濟命脉，經過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全国的經濟得到恢复和發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占居优势。一九五二年国营工業已占全部工業产值的百分之五二点八；国营商業已掌握对外貿易，已占国内批發業百分之六四，已占零售商業中相当比重；国营運輸業已掌握了全部鐵路運輸和大部分輪船運輸；国营机械化农場也已出現；銀行極大部分为国家所有；新建和改建的大工業也已着手进行，这就是說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已在全部国民經济中占居优势，这种优势日益發展。而只有在这种国家經濟命脉掌握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經濟手中时，方能計劃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在这种国营經濟領導下的国民經济得以大步前进。同时由于国营經濟占居领导地位，我們也就可能經過合作社的道路来对农業、手工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經過公私合营的过渡形式到国有化来对資本主义工商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且已取得成效。这就是我国能够进行国民經济計劃化的第二个基本条件，也可以說是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主体方面的条件。

第三个基本条件是进行对农業、手工業和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們在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时期，不能讓社会主义經濟建筑在小农和个体手工業的基础上，不能讓社会主义經濟长期地同資本主义經濟并存下去，必須进行对于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多种經濟成份的中国轉化为单一社会主义經濟的中国，因此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我国进行国民經济計劃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当然，⁽¹⁾这并不意味着必須等待社会主义改造完了再进行有计划的建設，而是

說我們在进行有計劃建設之前，这种改造已經开始并提供了在有計劃建設的开始几年中可以完成改造的可能性。我国六亿人口中約有五亿农民，因此胜利完成对于农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是重大的。我国对于資本主义工商業，不是采取沒收的政策，而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使它們經過各种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形式过渡到国有化。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消灭資本主义經濟和消灭产生階級和剝削的根源，以便于社会主义經濟更快地發展起来。

第四个条件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他們对我国經濟建設的偉大援助。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偉大援助，也是我国进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国現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比之当年苏联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时代是有利得多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苏联，周圍是帝国主义；我們今天的环境，周圍虽然还有着許多帝国主义包圍，这一点必須促使我們时刻警惕，但是同时已經存在着建成了社会主义、正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强大的苏联，存在着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蒙古、朝鮮、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对于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建設，給予了偉大的、無私的、系統的、长期的、無微不至的援助，这包括着帮助我国設計的許多現代化的大工業（直至和平利用原子能），供应現代化的設備，給予长期低利的貸款，發展两国間的貿易，派遣技术专家前来中国实地帮助等等，这种援助極大地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进程。同时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苏联和各兄弟国家有計劃地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教訓，这样也使得我們少走弯路，少犯錯誤。

以上前三条就是我国能够实行社会主义計劃經濟的基本条